

钱
伟
长

跨越世纪

2000年至2001年文集

KUAYUE SHIJI

KUAYUE SHIJI

上海大学出版社

跨越世纪

——2000年至2001年文集

钱 伟 长

上海大学出版社

·上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跨越世纪: 2000 年至 2001 年文集 / 钱伟长著.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2. 9

ISBN 7-81058-471-5

I. 跨... II. 钱... III. ①钱伟长-文集②社会科学-
文集③自然科学-文集 IV. Z4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2084 号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延长路 149 号 邮政编码 200072)
上海市印刷七厂一分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11.5 字数 193 000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 100 册
定价: 36.00 元

序

“跨越世纪”用作钱先生的这本书名,再恰当不过了。书中的绝大多数文章,完成时间都在 2000 年初到 2001 年末,正好从 20 世纪跨越到 21 世纪。但是,“跨越世纪”的含义还不仅于此。

先生于 2000 年的下半年,因身体有恙而住院治疗,是先生顽强的意志或是先生早年体育健将的底子,使得先生的身体状况从困难中跨越出来;2001 年初,敬爱的师母因病离我们而去,所有的受业弟子都感到震惊与悲伤,同时,无一不担心与师母相濡以沫、风风雨雨共同生活了六十多年的先生。然而,先生以超乎常人的毅力,从失去亲人的痛苦中跨越了出来,继续他所钟爱的教育事业和科学研究。那些天里,先生仍然继续与前来看望他的上海市领导以及上大所有学院的领导、教授进行交谈,为后来的师资队伍建设以及“评”改“聘”制度打下基础,也为上海大学的进一步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与先生其他的书不同的是,这本书中收集的内容种类比较多,可谓文理兼收并蓄。既有回忆四叔父钱穆先生、追思其培养和养育之恩的文章,也有给相关友好单位的贺信;既有对古典数学问题的再研究和创新挖掘,又有紧密结合工程技术的前沿、对非线性问题的独到分析;既有对中国一些历史问题的深刻思索,又有对当今社会发展各种问题的真知灼见。文集中的一大部分笔墨集中在国计民生的大事上,如对南水北调问题的研究与看法,对西部开发尤其是新疆建设的几点建议,对长江中游武汉经济区研究工作的重视,对环境保护、防沙治沙的见解,等等,无不凸显出一个耄耋老人浓浓的爱国情怀。其实,这种情怀随着年龄的增长是越来越浓的。从先生早年的弃文从理,到负笈加拿大求学苦读;从海外扬名再辗转回到祖国怀抱;从遭受不白之冤,到重新以高龄担任校长,把一个规模较小的大学办成了一个全国一流的应用研究型大学,这种爱国情怀成了贯穿先生一生的不竭动力。

如果说爱国是先生的精神支柱的话,那么,科学研究与教育就是先生的生命。这本集子的另一大笔墨正是着力于此的。先生一直很重视人才的培养,强调在“教”与“学”的一对矛盾中,学生是主体,因此学生要具有自学的能力,要有

2 跨 越 世 纪

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而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居于主导地位,教师要指导好学生、教会学生自我获取知识的本领,必须要进行科研。先生在文章中还强调,大学教育要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训练,既要有科学精神,又要有人文精神,让学生具备辨别真伪的能力,抵制伪科学的侵蚀。在教学的细节上,先生还指出,人文科的教育要理论联系实际,要关心社会的发展,可通过案例教学等形式丰富教学活动。

当然,书中也收集了部分采访先生的文章,因为是先生自己叙述的部分较多,所以也纳入先生的这本文集。

通读全书,使我感到光阴回转,二十年前第一次聆听先生教诲的情景历历在目。二十年来,先生依旧在学海中耕耘不辍,创新不断,成果叠出。作为受业后学,更应以先生为榜样,在各自的岗位上作出应有的成绩,来回报先生的培育之恩。

“跨越世纪”其实是先生精神境界的跨越,从一个境界跨越到更高的境界,不断进行着人生的升华,这就是先生的爱国精神、创新精神、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先生正是用自己的行动实践着“活到老,学到老”和“终身学习”的理念。

此文集出版之际,恰逢先生九十华诞,特此恭贺先生健康长寿,伟业流长!

受业 周哲玮

2002年夏

目 录

怀念钱穆先叔	
——钱穆宾四先叔逝世十周年忆养育之恩·····	1
对于新疆大开发的几项建议 ·····	25
如何培养有创新精神的人	
——在上海大学中层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	36
中国魔方的构造特性及其不惟一性问题的研究 ·····	43
关于我国水利建设的几条建议 ·····	95
附：国家计委回函 ·····	100
给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管乐团的贺信·····	101
鲜卑族的由来与现在的分布 ·····	102
“华夏”的由来 ·····	108
致朱镕基总理的一封信 ·····	114
附：国家信访局回函、农业部回函 ·····	115
团结就是力量 ·····	118
“地下”的科学工作 ·····	120
“上海大学案例教程丛书”序 ·····	122
长江中游武汉经济区发展战略研究丛书总序 ·····	125
付出终究有收获	
——谢志伟校长荣休有感 ·····	128
宁波甬江大桥的大挠度非线性计算问题 ·····	131
$x^2 + y^2 = z^2$ 的正整数解的几种解法 ·····	146
$x^2 + y^2 = z^2$ 的正整数解的一般解 ·····	157
在上海大学 2001 级研究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	163
如何培养有创新精神的人	
——钱伟长教授谈教育创新 ·····	方 荣 167
科学不能无中生有	
——访中科院院士钱伟长教授 ·····	辛 芑 173

怀念钱穆先叔

——钱穆宾四先叔逝世十周年忆养育之恩

(2000年7月)

1. 七房桥在六百年前由一个小木工,用了三代人的时间建成了七所大宅院,是一个明清 500 年间兴盛的封建地主大家族

先叔宾四钱穆在台北逝世已十载,先叔热念祖国,遗愿回归故乡,经各方协助,终于在 1992 年将骨灰安放在太湖西洞庭山南麓。先叔出生以前,苏南一带曾处于封建农业时代,过着鱼米之乡的富裕生活。鸦片战争开始后,帝国主义侵略,在五口通商不平等条约的压迫下,封建农业经济迅速崩溃,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财富不断从上海租界的吸血管中取走,洋油、洋烟、洋火等洋货蜂拥而至。先叔出生时正是 19 世纪 90 年代,江南的封建农业社会已经完全衰落,钱氏家族本来聚族来到无锡(当时是金匮县)东南角靠近苏州的河网地区,梁溪以南十公里,在嘯傲泾不远的高地上的七房桥村。这个村的兴起,是在明朝洪武年间。在元兵灭南宋时,这里和苏州、嘉兴等地均曾有反抗,所以杀烧破坏极惨,大量城镇受到毁灭。钱氏家族原居嘉兴北门外,当年曾逃难至太湖边上的崂崂山,其中有一个十几岁的青年,父母都死于逃难战乱,这个青年到了崂崂山,为了生活只好入赘无锡南坊前镇的陶家。到了 40 岁时,生了两个儿子,妻子去世后,他就和陶家族长商量,以长子续陶家香火,姓陶;小儿子姓钱,归宗钱氏。家产一切归陶家,并说明钱陶两家不通婚。他那时已经学得了一手好的木匠本领,专长农用水车和脱壳风车,他带着小儿子离开了南坊前镇,顺着梁溪向东,到了嘯傲泾。这一片约有万亩高地,当时农业收成并不好,在旱年没车水的水车,收成往往很差。这位木匠就在那里安家,以做水车维生。当时那里的农民很穷,他就做了水车出租,秋季不用时,农民把它送回来,他趁冬季对水车进行维修,在春夏之季农忙时,又负责安装修理,非常受当地农民的欢迎。他去世早,儿子接代,几年后儿子死了,孙子接代。三代以后,到了明代中叶,他的事业已经在该地区远近闻名,

而且有着最大的库房,也兼营打壳风车。以后又办了酒厂、酱油厂和南货铺,变成了七房桥的首富。他们就是钱氏家族在七房桥的起源。到明代末年,钱氏家族不仅是首富,而且是有着良田万亩的大地主。

2. 素书堂五世同堂,封建地主家族在 19 世纪 50 年代达到全盛时期

明代中期,钱氏家族有七个儿子,这位大地主和大富豪就花了十年时间在嘯傲泾北岸,离岸约 15 米的地方修建了七所在那时是非常豪华的宅院。每一宅院都是七进,每进都是七开间,每进之间都有两侧厢房,第二进中间三间是客厅,左右各两间卧房,还有左右各三间厢房,是接待宾客用的,第三进是儿媳、孙子的住房,也是一排七间,还有左右厢房各两间,是厨房和起居室。第四进中间三间是素书堂,是子孙辈读书用的。第五进是七间和左右厢房,厢房内有很好的厨房和餐厅,每十天由小辈陪长辈在此进餐。第六进是老辈居住和起居用的。第七进是客房,一般亲戚来访,都在这里休息。当然,也有几间仆人的住房。在宅院的两侧有东西两条陪弄,平日人们不走正门,由东西陪弄出入,两个宅院之间有一条共用的排水沟,排水沟上有石板块。两个相邻宅院之间,亦即陪弄之间有三个通道。每个宅院都有一个后花园。把每个宅院分给一个儿子和他的子孙住,所以每个宅院称为一房。在嘯傲泾的两端架了一座桥,人们将这一村子叫做七房桥。七房桥西端约 100 米处,还有三所宅院称为老大房、老二房和老三房,是洪武年间的老宅院,这是修建七房桥以前的钱家宅院,由修建七所宅院的老祖宗的叔伯兄弟后代住的,也是钱氏家族,但已是极远的远房。七房桥的房屋分配,也很特别,从东向西,第一座给了二房,我们幼时称为娉房;第二座给了大房,老祖宗住在大房的第六进;其次是七房、六房、五房和三房,而四房则在最西端。为什么要这样分配,我在幼年时曾问过先父和先叔,他们没有想到我会提出这样一个怪问题。他们对父母都很孝敬,那时祖父已去世,祖母指出,七个儿子,并不是一个母亲生的,前四人是原配生的,后三人是继母生的。继母和老祖宗当然住最大房里,但七儿子、六儿子、五儿子还没有成亲,虽然分了宅院,但都由奴仆管理,老祖宗不放心,所以把七房、六房和五房的宅院放在中间,而大房、二房、三房、四房分在两侧。这是合情合理的。

七房桥五六百年间一直由历代的老祖宗管理,佃户都向大房(代表老祖宗)纳租,也由老祖宗向金匱县交粮,多余的部分,平均分给各房。当然实际上历代都由管账的执行,管账的就住在大房宏议堂东侧一间厢房内,宏议堂实际上就是全族各房议事的地方。

到清代同治年间,大房出现一件大喜事,即我的曾祖父生了一个儿子(他是

曾祖父三男三女中的老二),这样就形成曾祖父母、高祖父母以及高祖父的父母和祖父母在一起,组成的五世同堂。这的确是不常见的所谓吉祥大喜,而且曾祖父当时还在南京中了举人,高祖也是举人,当时清朝正是在帝国主义列强压迫下,军事上屡遭败迹,走投无路的时候,金匱县知事为拍皇帝马屁,粉饰太平盛世,竟请皇帝御赐了“五世同堂”的四字横匾,还给高祖父的父母御赐“贡士及第”。这被钱族认为是最大的荣誉。四乡各村镇的封建地主们都来祝贺。金匱县知事也亲临祝贺。据说花了很多钱,热闹了前后约十天,我在小时候,还见到过这一块“五世同堂”的金字匾。

3. 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和列强侵略使这个地主家庭迅速没落,其中有一部分沦为贫困的乡村知识分子

五世同堂的大庆可能是七房桥最兴盛的时期,但好景不长,不到一年,五世中的老祖宗和最晚辈的婴儿先后去世。五世只剩下三世,接着曾祖父一连生了两个儿子,其中之一,即曾祖父的第四个小孩,就是我的祖父钱季臣。但是同时,太平天国运动占领了南京和苏州等江南地区,江阴、无锡是曾国藩的南大营所在地。苏州的太平天国部队和曾国藩的南大营就在梁溪隔河对垒,太平天国的前线指挥部就设在七房桥的“宏议堂”。那时曾祖父一家老小逃到荡口镇避难,住在亲戚华幼帆家的空余宅院内。荡口那时是苏、锡间的河网地区的大镇,居民约万人,有许多人姓华,也有不少华家和七房桥有说不清的姻亲关系,所以逃难期间,也还太平。荡口对外陆路交通不便,两军也没有在荡口接触,几年后,太平天国运动结束了,但七房桥的佃户有的参加太平军,有的逃亡后不知去向,有的业已死亡,只有十之二三留了下来,这就给地主阶级的七房桥居民造成了很大困难,不仅收不到租,而且还要向县里交粮。从这时起金匱的建制造业已撤消,七房桥和附近地区都归无锡管。县里知道这地区的困难,亦年年给予一定程度的减税,但每年都得申请。在19世纪80年代中,太平天国运动结束后,曾祖父就率家回到七房桥,这时四房的宅院已给大火烧毁,幸四房在太平军占领七房桥前,他们的户主已经迁居上海闸北,开了一个纺织厂,他们根本就不想回七房桥了。还有几家在动乱时迁居上海、常熟和苏州经商,也和七房桥脱离了关系。其他如三房和二房,人口本来不多,比较富裕,已经不靠佃户纳租生活。只有大房、五房、六房、七房各户在太平天国运动结束后,生活很困难,少量分到的一房的份额,实在不足以维持生活。我家在初迁回七房桥后,还能维持,但要维持各房的份额,困难万分。当时曾祖父是举人,还有举人的排场,把三个女儿嫁出去,就耗费了很多钱,而且高祖父母和他的父母亦先后去世,也因讲排场耗费了很多钱,

最后曾祖父母先后去世时,家中已经空无分文。这时,祖父钱季臣已经是县学秀才,挑起了族长的重担,祖父和祖母已经结婚,祖母是离七房桥 30 公里处蔡司堂村的一个秀才的妹妹,这位秀才和祖父是县学同窗,而且两家相距不远,所以一说就通。

4. 19 世纪 90 年代,祖父为解决生活困难,全家再度迁居荡口,祖父在荡口受到深刻教育,寻求解决地主和佃户矛盾的办法

在曾祖父去世时,祖父和祖母一共生了八个儿女。有两个女儿早逝,长大的有大女儿、我的父亲和四叔、六叔、八叔,儿子们的学名是声一、宾四、漱六、起八。声一名挚、宾四名穆、漱六名艺、起八名文。在祖父去世时,他们都只是十一二岁以下的小孩。祖父既要管全族,还要管全家,而且还很穷,还要不时去县学,不得已决定把全家搬到荡口,再度借住华幼帆的空宅。华幼帆的妻子是我祖母的姐姐,所以我叫华幼帆舅公。祖父在那里办了一个私塾,声誉还不错,学生也有一二十名,足够糊口生活了。荡口那时还没有新式的小学,但是有新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华澄波和华倩叔。华澄波是荡口毛司墙门的青年,华倩叔是荡口黄石弄华家的青年,就是现在北京的名画家华君武的堂叔,当时华君武还没有出生。华倩叔是早稻田大学的毕业生,同盟会会员,一心想着革命,但那时只能在黄石弄办个私塾,华澄波则在毛司墙门办了个私塾,这三个私塾当时是荡口镇上万余人口中仅有的三所私塾。华澄波一心想办个小学,荡口镇上没有出头支持的人,华倩叔的私塾办得与其他两所都不同,他自编教材,教格物、数学和中文,这成为荡口人互相传闻的话题。我祖父的习惯是早晨上茶馆,在茶馆里可以得到社会上传闻的各种信息,有时也可以看到上海出版的报纸,而且祖父的名誉好,办事公正,四乡的有些纠纷,也会在茶馆内由祖父公正解决,而祖父是秀才,有困难也可以找县知事研究解决。那时,这个地区最普遍、最困难的问题,是佃户交不起地租,而地主交不足粮食。祖父和华倩叔、华澄波、华幼帆等都想不出什么办法解决这个矛盾,只有在减租免税上想办法,但这些都是权宜之计,长期下去,政府不可能老免税,地主也不可能长期减租。我父亲和四叔那时十岁上下,他们在荡口小孩中互通有无,与三个私塾的小孩都有各种来往,由他们把华倩叔的数学、格物的内容告诉祖父,祖父亲自去见了华倩叔。从此,祖父与华倩叔、华澄波成了知交,经常讨论怎样解决地租和交税之间的社会困难,对孙中山的平均地权等想法也多次讨论,都认为只有革命胜利才有希望,但又多认为革命不是短期能解决的。他们对于太平天国运动同情的多,但是认为宗教性质太利害,尤其是太平天国的洋教色彩太严重,他们都认为以宗教为基础的革命,在我国历史上从来没有成功

过。所以，华澄波、华倩叔的门上都贴上僧道无门的红字照贴。

5. 祖父实现了有关建立钱氏怀海义庄的意愿，操劳过度而逝世，父亲和四叔在华倩叔、华澄波和华幼帆等人的支持下受到了新式的小学教育

祖父一家在荡口住了约 15 年，到 19 世纪末对怎样解决七房桥的贫困问题有一定的想法，他下定决心，全家离开了荡口，回到七房桥。他一方面和七房桥的族中各房商量，一方面同无锡县知事商量，同时祖母也和七房桥的各房女主妇进行商量，经过一两年的筹划，提出了一个建立“钱氏怀海义庄”的方法，来解决佃户和地主之间的矛盾。义庄由族长和一位公推的副主任主持监督，由两个或三个账房主持收租和交税以及福利工作。把原先亲自管的用地全部交给义庄管。族人交出田地是自愿的，如哪一房不愿意，则这一份额的地就划归这一房自己管收租和交粮，而且社会福利的权利也没有了。上海的四房最早拥护这个方案，而且申明四房在上海的族人都放弃福利的权利，只要义庄负责管钱家新老坟的维护和修理；一房、五房、六房、七房也都同意了这一方案，而且拥护上海四房提出的有关坟地的要求。在正式建立义庄时，四房的族长回家参加了盛典，并进一步提出解放家奴的要求。据说在七房桥还有七个家奴，但不称家奴而称“家人”，有三对是夫妇，一位是独身，他们都和主人关系很好，几十年中没有和主人发生过什么矛盾，只是没有姓只有名字，都叫阿根、阿爱等名，生的儿女还是家人。对解放家奴一事大家也都同意了，恢复了姓名，分给一定的土地，并在七房桥两侧修建了丁家村、王家村，让他们独立生活。当然，有两人仍旧愿意在钱家某房工作，明确是主仆之分，给工资，而且不是奴才。我曾祖父有个家人，是陪曾祖父和祖父去南京会试的老家人，他和他的妻子都是几代家人的后代，这时，他们也都逝世，他们的儿子叫阿根，还在祖父处当家人。当时，我祖父决定给他 30 亩田，在七房桥东侧盖了三间房，让他结了婚，姓华，并请他照顾曾祖父的新坟。20 世纪 80 年代我去七房桥访问，他的儿子成了七房桥村的支部书记，也已是一头白发的老人了，他还亲自引我去看曾祖父和祖父的坟地。最重要的是对佃户减了租，并由义庄派人去江北招来一批新的佃户，不少老佃户也可以扩大所租田地，七房桥各户有劳动力者也可以租田当义庄的佃户。这些田大部分都变成桑田，所以七房桥四周出现了养蚕热，使七房桥又恢复了生气。义庄制定了规定，凡是七房桥的孤独老人及失去父亲的未成年儿女，都可以从义庄领取每月每人一斗米和一贯钱，作为生活福利津贴，这样使生活困难的大批族人得到安置。账务是公开的，族人都可以查

询。这样的义庄制度当然必须由县知事同意,因为对克服太平天国后该地区的农业生产困难和生活安定是非常重要的,他也只好同意向皇帝申请,得到了降低纳粮的批准。降低比年年收不上来要好得多,这就是祖父为什么经常到无锡,和县知事商请批准的原因。这一次的批准义庄的过程,都是祖父和华家幼帆、澄波、倩叔等商量的结果,不到一年荡口也建成了黄石弄义庄和华绎之(当时华家的农业企业家,养蜂大王)地产建成的义庄,他们比七房桥更富裕,他们的福利还包括了在荡口办果育小学和华氏有关家族的子女离开荡口去无锡、苏州、常州上中学的补贴。不到三年,无锡、苏州、昆山、常熟甚至像上海附近的太仓、崇明等地也纷纷成立了义庄,义庄成了江南乡间最有力的经济组织,安定了农村,发展了农村经济,在江南兴办小学成了风尚,乡村贫困儿童有了社会保障,奴仆家人不见了。这一点从美国哈佛大学的学者,在无锡一带调查研究钱穆生平中有大量有关江南义庄的材料看,不能说是没有道理的。一直到解放后土改时,七房桥只划出两个地主,三个富农,其余都是贫下中农和村镇贫困户,而且两个地主早已迁到上海成了工商户。

6. 祖父去世,遗下祖母及子女五人,生活极端困难,在荡口华幼帆、华澄波、华倩叔等的帮助下,脱离了困境

祖父在完成这一活动中,劳累了整整三年,义庄建成后不到两年,就积劳成疾,在39岁时离开了我们。这时祖母才40岁,有儿女五人,长女即我的大姑才18岁,四个儿子是我父亲、四叔、六叔、八叔,都不到15岁。家无余粮,生活非常困难。正在这时,荡口的华幼帆、华澄波和华倩叔伸出援助之手,那时荡口黄石弄华家也办了一个义庄,义庄的主持人就是华幼帆和华倩叔,这个义庄还办了一个果育小学,校长是华澄波,就是澄波提出了由义庄出资保送我父亲和四叔在果育小学免费上学的,并和华族子弟一样还可以管膳宿费用和零用钱。这是因为祖父在创办义庄的过程中有功,而且大家都知道我父亲和四叔是有天资的乡间少年,这在当时就解决了很大的困难。同时,七房桥在上海的四房族长,忽然自上海下乡到七房桥访问,还带了一个自汉口来的武汉过江轮渡公司的老板,是四房族长在上海纺织厂的股东,说这位老板40岁,广东人,姓曾,原配病故,未有子女,想找苏州人续婚,所以,想到我的大姑,女大当嫁,他来做媒。经过商量,祖母也同意了,于是就在上海结了婚,由四房族长的妻子陪送到汉口。当时由四房的婶母带了200元给我祖母,作为安家费用,以后大姑也不时寄钱来七房桥,解决了生活困难。那时一二百元不是个小数目,小学教师一月工资也才八元或十元,一年也不过百余元。在祖父去世后,也有人建议,按怀海义庄的规定,祖母和她

儿女都可以申请福利,但祖母认为祖父办义庄绝非为自己,而是为全族贫困无人养育的人们,所以她始终不申请,反而为族人中贫困的人做申请的事务。那时,族人都叫祖母为二婶,二婶是族人中最受尊敬的人,她带着六叔、八叔经常回蔡司堂娘家去,娘家的舅父就是和祖父同学(在县学)的秀才。蔡家也是大族,也和怀海义庄一样办了义庄,解决了困难,乡间经济恢复很快。蔡司堂的居民,也都知道七房桥的二婶,甚至当面不称姑母,也称二婶。那时,华澄波特别看中四叔,想为他的一位表妹说婚,但祖父很早就为四叔与另一位在七房桥南边硕放镇的秀才的女儿定好了婚,所以,只好作罢。但把另一位姓徐的表妹说婚给八叔,年岁也相当,其实她就是荡口镇华幼帆家邻居徐家的小女孩,是当年和八叔、六叔经常在一起玩的小同伴,所以,一说就定下来了。

父亲和四叔在果育小学上了不到一年学,就由荡口义庄把父亲、四叔和其他 15 名学生一起保送到常州中学上学,一切费用也都由荡口的义庄负责。父亲进二年制的师范科,四叔上了四年制的本科。父亲毕业后,学校校长屠文博认为父亲品学兼优,要把他送到南京高等师范学堂去深造,但父亲认为家庭经济困难,只能回家在当时扩大的荡口果育小学做教师。这时果育小学已改名鸿模小学,学生扩大到十个班,华澄波还是校长,他认为我父亲是当时荡口最合适的教师,因为他学师范科,文才也不差,品德也很好。这样,父亲就在辛亥革命前夕,到荡口鸿模小学任小学教师,月薪八元,当年还在七房桥结了婚。一年后,生了一个女儿,但不到一岁就夭折了。又过了一年,生了我,这已经是辛亥革命以后的事了。

四叔在常州中学,在辛亥革命前夕,已经是全校有名的优等生,瞿秋白与他同班,四叔学习很用功,经常去常州宿儒施之勉(也是常州中学的董事)的家中去借书学习,施之勉对他有不少影响。就在这时,常州中学发生革命前的“学潮”,按学校规定,决定开除 15 人,四叔也在其内。但施之勉觉得钱穆是全校的优等生,应该是可以培养的人才,特为四叔写了一封信,推荐给南京一个中学,申请转学。四叔好像没有去,回到七房桥。接着武昌起义成功,南京亦响应,孙中山到了武汉,成立了临时总统府。江苏所有学校都暂时放假,等候南京政府的政策,鸿模也停学了,父亲也回到七房桥。兄弟两人就和族中青年办起团练,响应南京临时大总统,不到两个月,清廷宣布退位,时势大变,正式改为民国。接着学校复课,父亲在七房桥也创办了“七房桥又新小学”,聘了毛司墙门华澄波的堂侄华茂萱为校长。接着鸿模小学也复课了,父亲回到荡口,华澄波知道四叔已经回家,就聘四叔到鸿模小学任教。但不到半年,无锡县决定大办小学,在梅村办了一个无锡县立第四小学,华澄波任校长,澄

波去梅村任职时把我的父亲也带去了,任教务主任。四叔因为初到鸿模,不便调动,但在两年后就被调去梅村了。

7. 父亲、四叔作为农村教师,相继结婚,七房桥家里失火,全家又迁居荡口镇南端复盛墙门,家道平稳

全家住七房桥老宅,出嫁到汉口曾家的大姑在1914年曾回家一次。这时我父亲已结婚,并有一女一男。祖母和我父亲、四叔、六叔及八叔,还有我母亲和两个小孩住在七房桥。六叔和八叔在荡口鸿模小学上学,父亲和四叔在梅村第四小学任教,四兄弟只有寒、暑假才回家住几天。大姑母提出了四叔应该早日完婚,当时四叔是祖父在世时就和祖父的同窗秀才硕放镇南边的金娥墩邹家的女儿订婚。大姑和四叔在家时姐弟之间关系非常好,大姑母的话,四叔没有不听从的,所以,立刻就同意了,就在寒假中结了婚。四婶原是邹家的一个能干各种家事的能手,来了以后是祖母的好帮手。为此,我母亲从素书堂东隔壁的一间卧室中搬了出来,带了我的姐姐搬到宏议堂第三进的东侧第一间卧室居住。这间房原来是祖父的三兄的儿子思寿堂叔的住房,那时思寿堂叔一家都去了上海,在一家纺织厂里管账。好在这间房走东陪弄离第四进素书堂很近,祖母带着我住了素书堂的东隔壁那间住房。四婶的新房就在素书堂东侧的第一间卧室。在放假时,六叔、八叔返乡后就住在素书堂后半间书房里,外半间就是全家围聚的地方,也是会客的地方。暑期时父亲和叔父们都在这一间谈话、下围棋和演丝竹。父亲是玩笙的,四叔玩笛,六叔玩箫,八叔拉一手二胡,我和祖母有时给他们打碗起拍子。那几年家里虽然清寒,但的确是其乐融融。父亲开始要求四叔给我改作文,作文其实是我的日记,这是我的一种作业,还有一种作业,是要我为祖母记家账,这一作业对我来说要难得多,日记我可以找我认识的字记,记账则不能自己选择,祖母说一般油盐酱醋,学一次就记得了,但衣料和杂物等很多字我不知道怎样写,只好用同音字替代,尤其是人名字,十之八九我完全不知道怎样写。我最不愿意记账,而四叔最有耐心给我改这些错别字,而且在改正中,四叔父一定要讲这些字的组成笔画的特点和意义。几个月后,我在记账中学到了汉字的结构特点、最有用的形义和音义、偏旁等这些过去完全不懂的东西。半年后进步很明显,以至四叔就不再和我讲错别字,逼着我学写字。为了省纸钱,四叔父给我一块方砖,他把方砖一面磨光了,然后给我一支毛笔,沾着水在方砖上写,一个字要写几十遍,指出我字中笔画布局架子的毛病,一个字一定要写到十分合格的架子才许写第二个字。在这样严格训练下,我的写字得到长足的进步。他说,这只是学写字的第一步,要写出真正合格的好字,一定要长期练帖。他曾要求我学临

碑,但我并不喜爱,后来只好不了了之。第二年暑假,他回家说我作文还要练,但是他不给我改作文,而让八叔给我改,他说自己的作文是老式的,最近八叔以“捌手”为笔名在《小说月报》上发表许多短文,写得都很好,用的写法是新式的,所以让八叔教我,让我好好学。八叔用“捌手”的笔名写的短文很多,《小说月报》每期都有三四页,都没有题名,八叔给了我两期《小说月报》,说你看这些短篇,共有五十二篇,五天以后你给我每篇增加一个短题,越短越好,能用一个字代表一篇短文也可以,但题和文的主要内容应该是相同意义的。这样的作文我从来没有做过,初学以为很容易,一钻研,却远非易事,弄了三天,总算交卷。待八叔一篇一篇给我讲,每一篇原意是什么,为什么要写这篇短文的目的,也指出我的题目都不切原意,按我的题目,含义不明,会有多种不同的解说,有的可能和短文原意风马牛不相及,应该怎样写,教得一清二楚。一连讲了一天,才讲了一半。最后让我把后面一半重新写,两天后再谈。这次谈话给我的教育很大,使我晓得世界上的问题非常复杂,人们认识是很不相同的,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简单。

我很喜欢他们下围棋打谱,我也一定会坐在边上看。以后慢慢地我也看懂了围棋斗的是什么,斗的不是简单地吃掉几个子,甚至是杀掉一块棋,斗的是全局。要想取得全局胜利,一定要顾大局,一定要占先,让对方跟着你走。看棋到真的看懂时,是对看棋人的品格锻炼最重要的时候,因为这时很容易站在输方,甚至指手画脚,让输方按你的想法走下去。我在父叔等人下围棋时看棋,就不会进入这种发疯的场面,我在看棋中得到很好的训练。

素书堂的书橱给了我很多读书的机会,在暑期中,素书堂是我的天下,什么都看,不懂的也看,当然,我对《三国演义》之类的书看得很早,也看得很多,其他《史记》、《汉书》之类在我长大一些时也看,当然,在看这样的书时无意中会养成读别字的习惯。有一年四叔父发现我在家什么都看,他就告诉我他小时候,也是什么书都想看,就养成了读别字的习惯,他说这些字,意义完全懂得,但读音则是自己无意中创造的,习惯养成了就会影响你和别人的交流。他给我买了本教我读音的字典,使我在七岁时就懂得用字典的方法,改正了我从古书中自己创造的读音,当然,那时我学的是苏州地区的音,后来到了北京亦造成很多困难,这种困难在参加了学生的歌咏团后才逐步解决,但即使这样,我现在还有许多单字音咬得不准。

8. 是什么原因促成四叔花了两三年时间写出《刘歆刘向父子年表》和《先秦诸子系年》的

祖父去世后,我家无产可分,所以一家四兄弟,我母亲、四婶母、大妹和我及

后来生的弟弟,全家都居住在祖屋素书堂东侧六间房屋内,父亲和四叔从常州中学回来后,正处辛亥革命时期,父亲、四叔是七房桥民团的负责人,六叔、八叔都在荡口果育小学读书,后来升入苏州二中和常州中学读书,只有寒暑假才回家。家庭的主要支出是两位小叔父的学费,家里住租房,不花钱,家里的主要收入是母亲、四婶和祖母的一年一度的春蚕,租了十亩桑田,桑田在平时种上一些油菜和大豆等作物,每天用家里粪便加些河水浇灌,既肥了蔬菜,又肥了桑树。一次春蚕,可以收入二三十元,因为我家里没有劳力,不养秋蚕,而把桑叶卖给养秋蚕的农户,也能有一二十元的收入,一年的家用就是依靠这些收入过的。父亲和四叔的学校工资,每月也才七八元,除了在校伙食费外,大概还有五六元,都用来供两位小叔父上中学。这样过了三年以后,素书堂失火,我家六间房烧得只剩我母亲住的在第三进上东头的一间房。第四进一排七间房还有东厢房全部烧光。所幸素书堂的大部分藏书和四婶的大部分嫁妆都抢救出来了,祖母的许多箱子和杂物完全烧光。我在梦中被西厢房的堂房伯母抢救到她的床上,我照样睡着没有醒,一直到火延烧到西邻时,他们才从床上发现还有一个熟睡的小孩,把我抱到另一邻家中,救了我一命。这次火灾使我家失去了继续在七房桥居住下去的基本条件。父亲和四叔也回来了,共同研究怎样处理后事。按四叔的意见,父亲在梅村当老师,可以迁居到梅村,但梅村是较小的中等城镇,找房不易,人地生疏,生活不便。四叔那时是果育小学的老师,从前祖父一家在荡口住过十年,情况熟悉,况且还有华倩叔、华澄波、华幼帆等老朋友和老亲戚的帮忙,能找到合适的房子。他估计荡口街上肯定有这样的房子,只是租费可能高一些,但这是可以谈判的。所以四叔连夜回荡口去了,他给他的学生讲了这件事,不到一天,有好几个学生提供了各种信息,他一处一处去看了一遍。在镇南有个宅院,过去是个大家庭,现在大部分人都去了上海,这个大宅院只有一位老太太住在里面,带着一个小孙子,就是四叔的学生。这所大宅院叫复盛墙门,其东边有独立的宅院,有两进向南的平房,一共有十六间,其中第一进三间是客厅,另外三间铺了地板,其余都是砖地,有个不小的后院,有口井,有两棵桃树,正结着鲜红桃子,很是诱人。这位老太太知道四叔是个有才的教师,还从上海的儿子那儿晓得我的祖母和父亲,很想和祖母那样的人作伴。便特别说明本来她家想把三间房子修成地板房,但是,后来他们三个儿子都带着家里人到上海去了,地板材料放在那里四五年,没有再修,如果我家要, she 可以送给我家,做个见面礼。所以我们只出很少钱,就把向阳的房间修成地板房。她还叮咛,这个院子让我们住,房权是她家的,但不收费,算作为她家看房子。这个独立的宅院没有大门,从复盛墙门的大门进出,可能不方便。她自己现在也不大进大门,而进出西边侧门,方便得多。她建

议在该宅院南边围墙开个门,就方便得多。以后,复盛墙门的大门也不开了,他家走西侧门,我家走新开的门,两家在后园相通,一样方便,两全其美。这些当然都是对四叔的优待,不久,我们就决定搬到荡口南街复盛墙门住。听说这女主人的丈夫原来是荡口有名的蜜蜂大王华铎之在荡口养蜂农场的主管人员,当时已经去世了。华铎之是荡口镇南街的大富翁,上海华铎之蜂蜜公司的老板。他不购土地办企业,有十几条一二千吨的养蜂轮船,远到海南岛和长江、洞庭湖等地采蜜,主要则在太湖四周采蜜。他们农场里有很多果树和养鸡场,荡口半条街的人,都在他的农场和公司中工作。华铎之在荡口鹅真荡里曾有一片造船厂,还创办果育小学,后扩大改名为鸿模小学。我家大约在 1918 年迁居荡口,从此脱离了七房桥,但父亲因为族内活动很多,还经常在假期中去七房桥,但三位叔父就很少再去了。

1919 年秋,四叔接受后宅(现名硕放)邹家即四婶娘家的邀请,筹建后宅小学并任校长职务。我那时大约六七岁,四叔主动要求把我带去上学,由我祖父的老家人阿庚来照顾我生活,阿庚是小学的校工。白天上学,由四叔照顾,三餐和晚间由阿庚负责,前后在后宅小学住了两年。四叔在后宅从无到有,盖了一排课堂小楼,修了一个很大的操场,还建了一个图书馆。现在这个小学成为后宅中学了,学生有 500 人之多,图书馆操场还在。在修建这些设施时,四叔动员学生、家长参加,操场原来是一片桑田,只用一个月的功夫,把桑树拔掉压实平整就完成了,这在后宅建立了一个榜样,还开了个庆祝会。他曾从上海请了三位老师,都是很好的老师,一个姓蔡的和一個姓赵的老师在 1927 ~ 1928 年蒋介石清党时,被说成是共产党而在无锡杀了头。现在看来他们都是上海工人运动中的知识分子,是四叔在常州中学学习时的同学,或是当时的同学介绍给他的。他们可能在上海活动太多,呆不下去而到无锡乡间避难。蔡赵之类,可能根本是假姓名。特别是赵先生,对我很好,我经常去讨教,尤其是绘画,他画得一手水墨画。四叔那时一心想办好学校,后因患初期肺疾,迁居图书馆楼上休息疗养,孤寂时临许氏《说文》,学写篆体大字。那段时间四叔读了许多以前未见之书。两年后,我父亲离开了梅村小学,被无锡荣巷荣家办的公益学校聘为教务主任。该校只有小学五年级、六年级两班和初中一、二、三年级三班。父亲把我带了去,也算是考进去的插班生,插小学六年级,考试只考作文,这对我应该没有问题,我最怕的是数学,如这门课要考,肯定考不取。我和荣毅仁是同班,但并不熟悉,因为他身高,又是走读的,所以接触很少。在公益学校读了不到一年,学生为了北伐而罢课,荣毅仁的父亲是办这个学校的校董,他认为办这所学校是为公益,而不是为政治,就命令停办,从此父亲就带着我回到荡口。这年春天,无锡办中学的风气大